

國
民
革
命

漢
民
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著	校	發	印	總代發行所	分代發行所	寄售處
者	閱者	行者	者			
陳	胡	自由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東馬路四號	上海華馬路四號	本外埠各大書坊
白	愁	出版	上海北四川路B字廿號	圖書局	書局	
虛	珠	社	電話北二一四三			

陳白雲先生任中華新
報撰述時與袁氏帝制
奮鬥至成功之日終恆入
社與共事者五年自是
闊別十載各自東西先生
而任國事之重時而退隱著
作所著書與革命相密

切相連續也今新著國民
革命或郵寄俾得先
觀之快身與事而論述自
與尋常遠不同奉題教言
欽至價值

吳敬恆



自序

序 自

我既在人類社會做生活的工作。就一方對於「以無法執爲解脫」的空觀，認爲虛玄；一方對於「以無成見爲高明」的俗說，嫌其圓滑。總想得着一個合乎主觀客觀的主義，及能够實現這個主義的方法。照那專念阿彌陀佛的佛教徒，執持名號，一心不亂的念到壽終正寢，成就一個唯心淨土的極樂國土，爲我做人的標準。及至得着孫中山先生發明的三民主義，及能够實現三民主義的各種方法，乃由生信而發願以至於奉行，亦已二十年不變。偶然聽到有人說我爲人頗好，不過固執黨見太深的褒中帶貶之詞，反自問我已做到這種地位嗎？如真能够固執黨見，亦就不愧爲人了。不過自興中會到今年一月，其間雖無一日不是生活於革命的空氣中，但除了民元民四，因黨中的職務關係，民九民十二，因黨內的改組關係，曾照例的入過黨以外。却是前後都未正式加入。一因十三年以前的黨。同志多未仰承總理的意志。注意黨團的組織。黨員的訓練。黨外的宣傳。故我只幹革命而不入黨，即曾入黨亦並未重視。一因十三年以後的黨，可說以前太不注意的三點，已經有了大大的注意。但又爲共產份子所亂，冷了我的黨治興味，故亦未曾加入。至於今年一月入黨的動機。乃是苦心的而非快意的。因爲共產黨人的陰謀，已完全表現是奉行該黨憲法上入黨

滅黨的條文，並非保守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原約。遂計算三個月後，國民黨怕要在理論上失敗，六個月後，國民黨怕要在事實上消滅。常拿這個武斷的話，向同志作悲憤之談。又想徒然悲憤，亦屬無益，盛氣的反對，又會被指為反動的右派。只有重新入黨，放下一切，做成一個七萬言的議案，向黨中提出。同時印刷萬本，分送黨員，請求贊成，並不對外宣布，以期同志發生清黨的感覺和決心。故全文只求適合總章七十四條「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的條文，以便提出。固知如此亦不能見容於跨黨叛黨的怪物（此二字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自稱的名號）仍必以黨律加我以處分。但此書已能送到同志面前，總算盡了我的責任，尙管什麼處分。於是費了二十多天工夫，做成此書。乃又因工人怕得罪了共產黨，不敢承印，以致延遲了三個月。幸而吳稚暉同志，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提案清黨。使我的苦心，已可快意。但是病象仍重，意何能快，所以詳說脈案妥擬方藥的本書，仍有公諸同志及國人的必要。因於付印之日，聊說幾句，爲我固執黨見太深的紀念。

民國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序於三民週報社

國 民 革 命

第一章 緒論

以姓名不聞於著作界的我，竟大膽的來做書，且做四面不討好的書，這不是我發狂，大約亦如春末蛙鳴，秋初蟬噪，雖惹人厭，亦是隨着氣候不得不發的聲音。

述而不作，竊比考彭，亦吾人應抱的態度。於是恭讀中山先生說的，『此刻講社會主義，極時髦的人，是贊成馬克思的辦法。所以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來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甚麼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又說：『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又說：『不過辦法各有不同』。又說：『但是不能拿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又說：『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又說：『但在中國實

業尚未發達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又說：『我們受屈民族，必先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讀完以上的話，以下全書，都是照此發揮。以我的觀察，若是專講奮鬥，共產黨一方不怕死的去打軍閥與帝國主義；一方又不怕苦的去做法工作；大有忠義堂一百零八個好漢的氣概。比較腐敗分子，用心確是很好。但同時去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外，又添出打倒資產階級，智識階級，許多名目，幾乎不以個人有無反革命的嫌疑為標準，乃以階級有無反革命的嫌疑為標準；又於下層工作中，不是專做扶助農工的工作，乃是專做農工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工作。合起來看，竟是拿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如果不將這種辦法使其轉為恰如題分的國民革命，恐怕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句遺訓，就未免令人擔心。

我既遵照中山先生所說的話，以觀察現象，第一就應該將馬克思的方法與中山先生的方法，各有不同的性質，略為比較；第二要將馬克思的辦法，已經在中國表現的事件，略為舉出；第三要將馬克思的辦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理由，略為說明。但是學識淺陋的我，實在沒有這種本領。於是想出一個又拙又巧的方法，就將現成的國民革命四字，作個目標，希望各界各派的人，——尤其是國民黨人，都向這個目標去觀察；如能認清國民革命的意義，則什麼叫國民黨的方法，什

麼是共產黨的方法，都可全局了然。反赤的不必再亂罵，赤化的不必再客氣，似赤非赤的亦不必再含糊。因為表面上的事實與心理上的手段，雖有相互關係，但既成爲事實，利害即隨之而生；雖說不過手段，時期亦不能過久。所以亂罵未必能成功，客氣未必能抹煞，含糊亦未必能有效。是國民革命四字，有包舉通體的功能，有分別涇渭的作用。昔有人問一和尚，『什麼是無明』？和尚說：『你怎配來問這個』？那人便大怒。和尚又說，『這便是無明』。那人乃悟。如有人問我，『什麼是國民革命』？我是不待人發怒，即指這書說，這便是『國民革命』。

但是，現在已經轟動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國民革命軍，已有可決中國存亡，國民生死的極大關係。乃國民對於『國民革命』一名詞，則似少人注意。或雖注意，亦多不了解。惟有發生疑惑，仇恨，狂熱諸心理。總而言之，都是莫名其妙而已。此其故，乃一半由於國民黨的本身，含有共產黨的質量，故無論如何辯白，如何劃分，總不免使人視爲非黃非赤的灰色態度，國人自然莫名其妙。又一半則由於奉直聯軍，對於耶教式的西北國民軍，叫他是赤化，同時又把反耶教的國民革命軍，叫他是赤化，甚至凡有民治思想之表現者，都叫他是赤化；弄得毫無標準，國人更莫名其妙。當局既搆成莫名其妙的現象，國人自必懷着莫名其妙的心理，此不得謂非國民運動一大憾事！因此之故：於是由於客觀條件具備而發生一種革命方式，如現所

謂『國民革命』一名詞，本含有極大的意義，極嚴的界說，乃等於無足重輕的隨便稱呼。不知國民黨所以用『國民革命』四字，乃因注重革命史上所稱民族，民主的革命，而姑沿用，實又含有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的意義。因而根據此意義以組織的軍隊，乃更不是與什麼護國軍，護法軍，討賊軍，安國軍，以至簡稱革命軍的隨意應付。他乃是，認清了革命的原因是什麼，革命的對象是什麼，並由學理上，事實上，認為最適宜的而且可能的一種進行的方式。而這方式乃為全世界各種革命方式之一種。凡屬受同樣壓迫的國民，必取這方式而始能得到解放；若不取這方式而另取一方式，或取這方式而又同時雜入他種方式，都足為革命的障礙而不易成功。可見『國民革命』這名詞，所包含的意義，真有如孔子所說『必也正名乎』的『名』字那樣重大。既有那樣重大的意義，那麼，處在次殖民地地的中國人民，處在國際帝國主義與本國軍閥雙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不但對於『國民革命』四字，應該有大家知道的必要，且應該有大家起來實行的必要。但是國人對於此次起來的國民革命軍，無論處何地位，亦無論為贊成，為反對，為中立，除了無表示的無從看見外，都是憑着主觀的地位，發出許多混沌的支節的論調；不但不知國民革命有何意義，並且不知此乃是革命，而與歷年軍閥各次的戰爭絕對不同。這是目前最可怪而且可悲的現象。今先將這種現象，分三方面來說明：

(一)在反對國民革命一方面的人物——軍閥，常說不是反對國民黨，不是反對三民主義，乃因國民黨中夾有共產黨員，三民主義中夾有共產主義，又因國民政府有俄。鮑羅廷專權，國民革命軍有俄人加倫用事，即是爲俄利用；又因國民黨已不用五色國旗，已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即是賣國的憑證；又因國民黨實行共產公妻的制度，即是破壞名教綱常的洪水猛獸，又因國民黨實行三三一制，將使以農立國的中國農民與地主都不能活。總而言之：就是因爲國民黨已經歸化了赤俄，變成了赤黨，所以要討赤。其實，十三年以前的國民黨，何嘗有什麼赤化，何以軍閥與國民黨的戰爭，連年不休？可見討赤一名詞，亦不過藉爲口實。因是藉口，所以對於赤化的認識，就多胡說。比如現在明明只有一個國民黨的名義，雖有共產黨員加入，但已接受三民主義，就是國民黨員。國民黨是主張國民革命，凡是願作國民革命的國民，都應歡迎。共產黨員既願來作國民革命，自應一律歡迎。試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最新的共產黨員，固可加入，同時最舊的段張，亦可合作。至於加入後又反對國民革命，自有國民黨的黨律來制裁，無庸敵黨代爲擔憂。如不制裁，就會先行消滅國民黨，豈有國民黨員不怕消滅國民黨，反使敵黨先怕的理由？如說國民黨員都已赤化，試問高唱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員，豈肯承認？此理頗與親告罪的性質相似，所以民黨大聲否認，中外赴粵調查的亦無不加以辯護。這是反亦可笑的一點。

：鮑羅廷與加倫，在名義上不過國民政府的顧問，政府聘用顧問，本是常事，若說他專權用事，是棄名義而論實際，論到實際，只有當局方能認識真切，旁觀實難證明。若說當局已受劫持，但蔣介石一怒，而俄員盡走，能說願受劫持嗎？至於聯俄一層，更有許多議論。最要的，是說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以前自動放棄在中國的特權，乃是欲取先與的毒計，所以一面仍侵略蒙古，一面佔據中東路，現在又挾着國民黨來侵略中國了。但國民黨人，縱不明白，不能看到這種禍害，若首主聯俄的中山先生，就不能說他爲着利用蘇俄，亦不知這種禍害。中山先生說：「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改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因爲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爲世界伸張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全靠甚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又在臨終致蘇俄的遺書上，亦說：『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

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又在遺囑上說：「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有人說：遺囑是假造的；但中山先生主張聯俄既是事實，就無爭論真假的必要，況遺囑上亦並未指定俄國；是以平等待我為標準。這是對於聯俄政策最要注意的一點）。可見中山先生聯俄的根本原因，是因他專為世界打不平。他何以肯為世界打不平呢？是由他的主義在共產，他的方法在階級鬥爭，他的目的在世界革命，實現共產社會；並沒國界種界，只有一個階級的界限。所以有工人無祖國的口號，如有祖國，就是工人專政的國，乃是他的祖國。因此遂不能謂其侵略某國，只能謂其侵略某國的特權階級，如中國的軍閥一類，何能與從前及現在的縱橫家的外交政策一樣去觀察？所以國民黨人對於蘇俄侵略中國的話，有非常堅強的駁論。只看汪精衛作的「國民會議國際問題草案」末段，亦就可知大要。故說聯俄是上當的事，不過徒供黨人笑為外行的材料，並為指斥軍閥聯日聯英是真上當的反響。這又是反亦可笑的一點：再說國旗，中山先生是在未曾聯俄的十六年前，已在倫敦寓內，親手畫定了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作國旗，並製五十面遍懸唐人街。我亦親見友人存有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的「革命方略」一小冊子，內中印有旗的式樣，并有旗的說明，與現在國民黨用的完全相同，確是一個明證。那時俄國尚是帝制時代，可說與他沒有絲毫關係，何能指為賣國。這又是反亦可笑的一點：再說共產，公妻；共產乃是

赤俄的主義，現亦並未實行，國民黨更沒有此事實。即論主義，亦只有「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句指將來的話。單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個辦法，就足證明尚有私產。公妻二字，實不成一名詞。就是共產黨的主張，亦只有打破家庭制度，並無夫妻名義。至現在的蘇俄，尚有婚姻法，自然尚有家庭。妻如可公，直是蹂躪女權。若做到男女自由戀愛，則又無所謂妻，尙何公之可言？現在許多野合，私奔，軋姘頭等的勾當，如使其中有有夫之婦，却可說像是公妻，若使無夫，就是自由戀愛，何以人人又不以為怪？乃憑空想一公妻的怪名詞，大罵黨人，豈非無的放矢。這又是反赤可笑的一點；至於三三一制，乃是說明學理的一個方程式，那有這種制度行到農人社會的事實。像這樣罵不擇言，不過自獻其醜。這又是反赤可笑的一點：一年以來，最濃厚的反赤聲浪，不外以上幾點。這種聲浪，不但黨人認為無一辯的價值，從未在黨報上發過一篇正式辯駁的文字，即非黨人的學者，苟非賣好軍閥，亦從無人肯作這類的罵聲。其餘專講切身利害的一般國民，更是充耳不聞。像這樣浮泛支離的反赤，能懂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嗎？

(二) 在學者一方的人物；已經研究政治經濟社會等學，已經看過馬克思的著作，知道唯物史觀及賸餘價值的意義；甚至曾到過俄國，實地調查；乃又將國民黨與共產黨混而為一，常以共產主義去反對國民黨，不知以三民主義去反對共產黨，

並只知反對他的主義，不知反對他的方法；於是或說，共產制度，已在俄國失敗，更不能在中國實現；卽任其宣傳，亦不足怕，或說委員制的主任權力過大，失了合議制的精神，不合通例；或說，工人罷工等事，幾使人人談虎色變，認爲世界已到了末日；或說，共產黨爲盧布黨，如無俄國金錢，就會散夥，且人數甚少，只知共人之產；必難成事。其餘議論，不知若干，都是浮光掠影之談，不知這個從古沒有的怪物——共產黨的眞象。雖然反對，亦是枉費氣力；我今敢告這些學者先生；共產主義，是最公道的主義，大概可說與禮運上的大同之世一樣，是不必去反對的。國人應該而且必要反對的，乃在他的方法。如不反對他的方法，惟是藐視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便任他進行，結果必大受其害。因爲共產黨有一個最巧最毒的方法，只要能够奪取政權，終能達到實現共產主義的目的。這是什麼方法呢？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只是根據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崩潰，繼之者必爲社會主義的理由，依着進行；並非不問國情，一得政權，就馬上要實行共產制度。至於何時方能實行共產制度，乃是跟着客觀的趨勢，並不憑着主觀的武斷。其中要經過多少年月，並無期限，只是未成立共產社會的一日，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日。須知世界一切文化，都是人力造成；縱有天然限制，尙有許多可以人爲的科學方法去戰勝，何況人爲的限制，——如學說宗教制度習慣等類，豈有不能轉移之理？共產黨以

一黨的力，集權的力，專制的力。無期限的力，並挾民衆的暴力，日日向着社會主義進行，如有阻力，即照着治河的方法，隨其曲折的趨勢，總以向着東流爲務，自然總會成功。所以列甯可以暫時取消共產制度，改行新經濟政策，決不肯暫時放棄無產專政的權力。所以第三國際，不妨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革命的戰線，又命令不可忘記努力造成日益顯明的階級戰爭。以謀奪取政權；並不嫌其跨黨，亦不怕其脫黨。就可知道這個方法的巧而且毒了。共產黨以爲在科學組織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政府軍隊，都是保護資本家的工具，又在養成私有觀念的傳統學說之中，欲實現共產社會，阻力自然非常偉大，故認定歐洲所行什麼溫和的改良的議會政治，及國家社會政策，不但無益於勞動階級，反有礙於階級鬥爭；日非不憐恤地，不猶豫地，將一切舊式的道德，制度，習慣；概行摧陷廓清，必不能容納這種制度。既要摧陷廓清，又非出以最強最暴的力量，不能做到。最強的力量，無過於佔國民大多數的農工中的無產階級，（但在革命進行中，就有小資產的農工，亦要聯合，）最暴的力量，無過於專政。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就是大肆強暴力量的時期；所有國民原來的生命，身體，財產，職業，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等自由，都認爲共產主義的障礙，必要一掃而光。不但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等等，沒有絲毫自由；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共產黨員，亦同是沒有絲毫自由。因爲一切權力歸

諸黨，故只黨有自由。不過，黨是人的集合體；黨的自由，仍要黨員來行使；黨員行使黨的自由，以打倒一切階級，故黨員雖對黨無自由，也不過如貴族之對皇帝無自由；然其為站在壓迫的階級則一；而其他各階級的無自由，則是站在被壓迫的階級。如果壓迫的階級尚有自由，則或由於個性的仁慈，或由於倫理的關係，尚可對於被壓迫的階級，網開一面，略為放鬆，共產黨恐怕因此不能斬草除根，故必使黨員亦無自由。黨員既無自由，就有不忍之心，亦不敢發出；就對於父子兄弟師友戚族，亦不敢顧憐；只得遵照黨律去打倒一切。此乃集合刻覈寡恩的法家，及極端服從的兵家的精華，鍛成這個鐵的紀律的黨。於是這個鐵黨對於國民，只許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同去革命一條路。如不革命，學什麼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什麼思不出位，什麼素位而行，就是反革命，就要打倒。但是即去革命，又因階級性的不同，仍認為反革命，或認為投機，亦要肅清。老實說：就是使人無路可走！既是使人無路可走，自必逼到學那困獸猶鬥，與他拚命。但共產黨已運動大多數的農工來擁護，只有軍人的命，那怕人來拚命？所以結果，必能使階級消滅，必能使共產實現，再老實說：如中國不幸處在無產專政時期，必致國內四萬萬人，死於直接間接的打倒或肅清的，即比例不及蘇俄之多，亦總不致少到百分之二；亦就在八百萬以內。姑以二十省平均計算，是每省要枉死四十萬人；若以全國二千縣平均計算，是每